

税制改革、产权安排与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

谢香兵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计学院, 郑州 450002)

摘要: 本文以 2008 年我国公司所得税改革为背景, 以公司所得税改革后税率下降公司为研究样本, 观察上市公司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在公司所得税税率变化前一年, 税率降低公司存在显著的利润推迟的盈余管理行为, 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利润推迟盈余管理只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出现, 而国有控股公司并没有进行明显的利润推迟盈余管理。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产权安排对公司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关键词: 税制改革; 产权安排; 避税动因; 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 F239.22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从政府的角度看, 企业所得税是一种特殊的分配活动, 它体现的是一种政府为主导的分配关系。从企业的角度看, 企业所得税作为一项费用, 对企业的投融资选择、组织形式和兼并重组的决策、支付政策、补偿政策和风险管理决策等行为都有重要影响(Graham, 1996; Desai 和 Dharmapala, 2007; 王跃堂 等, 2010)。2008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由原来的 33% 调整为 25%, 原享受 15% 低税率优惠的企业, 2008 年后 5 年内逐步过渡到 25%。与 1986 年美国所得税法改革降低了所有公司的法定税率不同, 我国 2008 年所得税改革后的情况是, 一部分公司的法定税率降低了, 但原来享受优惠税率(15% 和 24% 两档优惠税率)的公司则在未来 5 年内, 其法定税率将提升到 25%。以此制度变更为研究视角, 王跃堂 等(2009)发现税率降低的公司存在明显的避税盈余管理行为, 而税率提高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不明显; 同时, 市场对成功避税的公司给予了正面反应; 李增福、郑友环(2010)、李增福 等(2011)发现预期税率上升的公司, 主要进行真实活动操控的向上盈余管理; 预期税率下降的公司, 主要进行应计项目操控的向下盈余管理。这些研究仅仅观察了在税率变革时期, 公司是否存在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以及采用何种盈余管理行为。即使面对同样的制度环境, 不同公司的行为也会存在差异, 特别是我国转轨经济体系中, 产权安排对公司行为的诸多方面产生显著影响, 并进而影响到公司绩效、市场表现。因此,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 公司所得税率下降的公司, 是否存在利润推迟的避税盈余管理? 进一步地, 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间的避税动因盈余管理行为是否存在差异? 如果存在差异, 其理论根源或内在机理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是王跃堂 等(2009)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而且为产权安排影响公司行为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当代公司税收研究的主要理论框架是 Scholes 和 Wlofson (1992) 在其开创性的《税收与企业战略》一书中所提出的有效税收筹划理论。他们认为, 传统税收筹划目标中税负最小的观点, 实际上忽略了交易成本, 有效的税收筹划应该充分考虑交易各方显性税收与隐性税收、税收成本与非税收成本的因素对企业投资和融资决策的影响。因而, 不同企业避税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可能存在差异, 现存文献基于此的研究主要从三方面展开: 其一, 通过研究公司存货政策的选择考察公司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 研究表明税负节约是公司选择后进先出

法的重要原因 (Dopuch et al., 1988; Dhaliwal et al., 1994); 其二, 基于会计税收差异的避税动因盈余管理研究, 即管理层是否会为了进行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 而愿意负担高昂的税收成本, 以及由于会计损益和应纳税所得之间差异 (Book-Tax Difference) 存在, 管理层是否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规避所得税成本 (Erickson et al., 2004; 叶康涛, 2006; 戴德明、姚淑瑜, 2006)。其三, 基于税率变动的避税动因盈余管理, 国外学者主要围绕美国 1986 年所得税改革的背景, 研究公司在税率降低时的盈余管理行为 (Scholes 和 Wolfson, 1992; Guenther, 1994; Thomas et al., 1998)。2002 年我国中央政府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取消公司的“先征后返”所得税优惠政策, 以此制度变更为基础, 戴德明、音亮 (2005) 发现受该政策影响的上市公司没有进行盈余管理, 但吴联生、李辰 (2007) 发现该政策显著提高了原来享受该优惠政策的公司的所得税负担, 并最终使它们的所得税负担显著高于享受中央政府认可的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司。以我国 2008 年的所得税改革为背景, 刘行 (2011) 研究表明, 上市公司名义所得税率下降时实际所得税率下降的幅度, 要显著高于名义所得税率上升时实际所得税率上升的幅度。李增福、李娟 (2011) 研究发现税率提高的企业提高了财务杠杆, 税率下降的企业降低了财务杠杆。同时, 资本结构的变动对税率上升更为敏感。王跃堂等 (2009)、李增福、郑友环 (2010) 的研究也观察到了所得税改革时, 平均来说企业存在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 但他们的研究没有探讨不同公司避税程度的差异以及差异产生的原因和内在机理。

本文研究的贡献是: 第一, 在研究视角上, 从产权性质、独立董事的监督效率等公司治理角度观察公司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 是王跃堂等 (2009)、李增福、郑友环 (2010)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并且用产权理论解释他们研究的结果。第二, 在研究方法上, 与前述两文采用时间序列估计盈余管理的方法不同, 本文采用分行业横截面数据估计经营应计中的非操纵部分, 因为时间序列分析需要较长时期的序列数据, Guenther (1994) 和 Thomas et al. (1998) 的研究用样本公司 1972 到 1984 年的数据估计, 而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上市年限普遍较短, 序列数据往往短于 10 年¹, 采用时间序列分析研究的结果将受到影响, 本文研究克服了这一缺陷。

三、公司避税动机的产权逻辑: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我国 2008 年实施的新公司所得税法调整了公司所得税率, 使公司的实际税负发生了改变。具体而言, 对于税率从 33% 降到 25% 的公司来说, 在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情况下, 如果将 2007 年的 1 元应税收益推迟到 2008 年实现, 公司将节约税收支出 0.08 元。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使得公司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进行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 进而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 (如征税机关) 的利益, 王跃堂等 (2009) 研究发现 2007 年税率下降的公司, 为了避税, 平均来说公司确实进行了利润推迟的盈余管理。在开创性的 Scholes-Wolfson (1992) 研究范式中, 公司避税必须考虑避税行为对各利益相关方的影响, 以及由此带来的所有商业成本, 有效税收筹划是纳税收益与非税成本两相权衡后的结果。按产权性质划分, 我国证券市场存在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 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 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行为可能存在差异。其一, 国有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直接或间接为各级政府, 而政府及其代理人作为国有股权的实际控制人, 只有控制权而没有剩余索取权, 与公司业绩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联系, 利润推迟的避税效应并不能直接体现。同时, 对政府本身而言, 税收与利润在某种意义上没有根本区别, 都是国家财富的增加, 因而, 相比产权关系明确、利益关系清晰的民营上市公司, 国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税收筹划动机较弱。其二, 从微观经济学的

信息不对称理论看,国有控股公司委托人与管理层之间存在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平新乔等,2003),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委托人很难判断公司利润下降是由于管理层的经营不善还是税收筹划,从而增加了国有控股公司税收筹划的财务报告成本。而民营上市公司相对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使公司控股股东能够了解公司利润降低的真实原因,据此能够对公司管理层进行正确的业绩评价。同时,不对称信息将导致企业面临的隐性避税成本(如代理成本、债务违约成本等)增加,从而直接影响到企业最终的避税决策(吕伟,2010)。其三,从公司管理层的激励机制上看,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既是国有控股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也是公司所得税的征收者,利税总额成为国有资产经营业绩的主要考核指标;同时,中央和地方国资委在对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激励机制设计上“利税合计”是其考核指标之一,这将进一步弱化国有企业进行避税盈余管理的动机(朱凯、俞伟峰,2010)。其四,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及其管理者身份的行政色彩,使其面临更高的非税成本,因为政府官员背负的行政职责决定了其职位的升迁和薪酬的高低。而民营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就是公司的管理者,其经济利益与公司绩效紧密相连,在税收筹划行为上,他们往往会更看重税收成本的节约而带来的现金流增加。Cai et al.(2005)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控股企业、外商投资控股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控股企业相比,集体所有制控股企业和私有控股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更愿意隐瞒利润以避税;白重恩等(2006)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文章通过对比控股公司改制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纳税水平,发现随着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增长,非国有控股公司上缴的税金变化不大,而国有控股公司上缴税金显著上升,从而得出非国有控股公司避税的可能性更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在税率下降公司中,相比较国有控股公司,非国有控股公司利润推迟的盈余管理程度更高。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2007年所得税名义税率为33%的A股上市公司,如果2008年公司名义所得税税率为25%或15%,则名义税率下降,本文通过以下筛选程序以得到税率下降的公司数:(1)因研究公司2007年和2008年的利润转移时需要2006年—2008年的财务数据,剔除2007年上市或退市的公司;(2)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3)剔除2007年所得税费用非正或未知的公司,所得税费用非正的公司不存在避税转移利润的动因;(4)剔除所得税税率上升或无法判断上市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或降低的公司,比如当母公司或子公司2007年享受税率优惠的公司,税制改革使上市公司既包含税率提高的公司又包含税率降低的公司,公司2008年的税率变化方向不一致,导致无法判断公司利润变化方向,所以一并剔除。

表 1 样本公司剔除顺序表

样本	公司数
2007年末上市公司	1549
剔除:2007年上市或退市公司	125
金融保险类公司(I类)	22
所得税费用未知或非正数公司	141
名义税率上升或无法判断上市公司名义税率提高或降低的公司	973

本文所用A股上市公司2007年的财务数据主要取自CSMAR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数据库。上市公司2007、2008年度的所得税税率数据是对上市公司年报中公司税率的披露进行手工整理。数据处理使用的是SAS9.0软件。

(二) 研究模型及变量说明

1. 利润转移变量

(1) 经营应计项目的衡量

公司应计项目通常分为两类：第一类为“非经营应计项目”(non-current accruals)，这些应计项目预期对应纳税所得额没有显著影响，如公司折旧费用；第二类称为“经营应计项目”(current accruals)，预期对应纳税所得额有显著影响，如公司的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因此，研究中常用第二类应计作为估计公司推迟应税收益的替代变量。在公司的经营应计项目的计量上，本文借鉴Thomas et al. (1998)的计量模型，我国学者王跃堂(2009)和李增福(2010)均采用了该模型，将经营应计项目定义为：

$$CACC_{it} = (\Delta AR_{it} + \Delta INT_{it}) - (\Delta AP_{it} + \Delta AE_{it}) \quad (式1)$$

其中： ΔAR_{it} 为公司i在t期与t-1期应收账款的变化额； ΔINT_{it} 为公司i在t期与t-1期存货的变化额； ΔAP_{it} 为公司i在t期与t-1期应付账款的变化额； ΔAE_{it} 为公司i在t期与t-1期应计费用(accrued expenses)项目的变化额。

(2) 非操控性经营应计项目的衡量

Jones (1991)将应计项目分离为操纵性应计项目和非操纵性应计项目，根据Bartov et al. (2001)对应计利润分离法各个计量模型揭示盈余管理能力的检验结果发现，与时间序列模型相比，截面Jones模型和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能够更好地揭示公司的盈余管理。因此本文将用截面修正Jones模型计算非操纵性经营应计项目，其中公司特征参数 μ_{1i} 、 μ_{2i} 用2007年末上市公司的数据分行业估计得出。

$$CACC_{it}/TA_{it-1} = \mu_{1i}/TA_{it-1} + \mu_{2i}(\Delta SALES_{it} - \Delta AR_{it})/TA_{it-1} + \varepsilon_{it} \quad (式2)$$

其中： $CACC_{it}$ 为公司i在t期的经营应计项目； $\Delta SALES_{it}$ 为公司i在t-1年和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额； ΔAR_{it} 为公司i在t期与t-1期应收账款的变化额； TA_{it-1} 为公司i在t-1期的总资产； μ_{1i} 、 μ_{2i} 为公司特征参数。

(3) 操纵性经营应计项目的衡量

操控经营应计项目可以通过该年公司总的经营应计项目减去非操纵经营应计项目得到：

$$u_{it} = CACC_{it}/TA_{it-1} - \mu_{1i}/TA_{it-1} - \mu_{2i}(\Delta SALES_{it} - \Delta AR_{it})/TA_{it-1} \quad (式3)$$

V_i 是将 u_{it} 标准化而得，即 $V_i = u_{it}/\sigma_{it}$ 。其中： u_{it} 为公司操控性经营应计项目的大小； σ_{it} 为 u_{it} 的标准差。 V_i 如果为负数，则表明当期利润推迟，若为正值，则表明存在提高当期盈利的盈余管理。

2. 多元回归模型的确定

本文借鉴Guenther (1994)、王跃堂等(2009)和李增福、郑友环(2010)、李增福等(2011)的研究，在控制规模、债务水平、管理层持股比例和利润平滑动因对公司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同时，又将第一大股东持股水平和独立董事比例以及行业变量纳入

模型，控制上述因素后的模型截距项（ α ）反映公司避税动因盈余管理程度。具体模型如下：

$$V_i = \alpha + \beta_1 \text{Property} + \beta_2 \text{First} + \beta_3 \text{Director} + \beta_4 \text{Manshare} + \beta_5 \text{Size} + \beta_6 \text{Debt} + \beta_7 \Delta \text{Eps}_i / P_{i-1} + \sum_{i=1}^{17} H_{Y_i} + \varepsilon \quad (\text{式 4})$$

V_i 利润推迟变量，我们以操纵性经营应计/操纵性经营应计的标准差衡量；Property 为产权性质变量，我们借鉴刘芍佳等（2003）对公司产权性质的衡量²，如果属于非国有控股公司为 1，否则为 0；First 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Director 为独立董事比例，用于控制独立董事的监督效应；Manshare 为管理层持股比例；Size 为公司规模，本文以主营业务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以控制盈余管理的政治成本动因；Debt 为公司资产负债率，控制债务契约动因； $\Delta \text{Eps}_i / P_{i-1}$ 为公司 2007 年与 2006 年基本每股收益的变化额除以 2007 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股票价格，以控制利润平滑的盈余管理动因；本文研究样本共涉及 18 个行业， H_{Y_i} 为控制行业影响而设置 17 个虚拟变量。

五、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分行业利润推迟变量描述性统计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利润推迟变量 $V_i > 0$ 的样本为 129 个，其中，产权性质为国有控股公司的有 81 个，非国有控股公司 48 个， V_i 均值为 0.558，标准差为 0.754，最大值为 5.712，最小值为 0.006；而 $V_i < 0$ 的样本有 159 个，国有控股公司有 109 个，非国有控股公司有 50 个， V_i 均值是 -0.688，标准差 0.810，最小值为 -4.664，最大值为 -0.001。具体的分行业利润推迟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2。

表 2 分行业利润推迟变量（ V_i ）描述性统计表

行业类别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A（农林牧渔）	6	-2.9854	2.8940	-0.1285	2.2505
B（采掘业）	12	-0.6500	0.8416	-0.0717	0.4133
C0（食品饮料）	14	-2.1997	3.6903	-0.0295	1.2874
C1（纺织服装）	10	-0.3811	1.7409	0.3589	0.6856
C3（造纸印刷）	6	-1.5914	0.9177	-0.1492	0.8739
C4（石油化学）	41	-2.1006	1.2713	-0.1506	0.6291
C5（电子）	2	-0.7237	0.0085	-0.3576	0.5177
C6（金属非金属）	23	-2.0338	1.8164	-0.1672	0.7757
C7（机械设备）	31	-2.1829	0.8660	-0.3126	0.7589
C8（医药生物）	19	-2.2600	1.8409	0.0613	0.8972
D（煤电水气）	17	-0.8548	0.7161	0.0765	0.3609
E（建筑业）	6	-2.4813	1.4663	-0.9264	1.3589
F（交运仓储）	19	-1.1216	0.5804	0.0372	0.3620
G（信息技术）	7	-2.8198	2.1765	-0.4402	1.8200
H（批发零售）	30	-1.4472	1.5667	-0.0188	0.6913
J（房地产业）	25	-4.6643	5.7125	-0.2724	2.0790
K（社会服务）	11	-1.9176	0.8350	-0.1772	0.6938
M（综合类）	9	-0.9795	-0.1590	-0.4547	0.3163

总体	288	-4.6643	5.7125	-0.1303	1.0000
----	-----	---------	--------	---------	--------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本文研究所涉及的样本中,总体 v_t 均值为-0.1303,绝大部分行业的 v_t 均值都为负数,18 个行业中占到 14 个。利润推迟变量均值为正的行业有纺织服装业、医药生物制品行业、煤电水气行业和交运仓储行业。

(二) 单变量分析

1. 全样本公司操纵性应计项目 t 检验

为了证实公司是否存在避税动因盈余管理行为,我们首先对全样本公司 2007、2008 年的利润推迟变量进行 t 检验,检验公司是否存在利润转移的行为,结果见表 3:

表 3 全样本公司 t 检验结果

利润推迟变量 (v_t)	均值	t 值	P 值
V07	-0.1303	-2.212	0.028**
V08	0.0530	0.900	0.369
V07- V08	-0.1833	-2.246	0.025**

(注: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

从表 3 的 t 检验结果来看,全样本公司 2007 年的利润推迟变量均值为-0.1303,并在 5% 水平上显著,而且 2007、2008 年样本组间利润推迟变量存在显著差异,并在 5% 水平上显著,初步说明 2007 年税率降低的公司确实存在推迟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

2. 分组样本单变量 t 检验

为了研究不同产权性质公司是否存在利润转移,我们将全样本公司分为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分别进行 t 检验。表 4 列示了非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 2007、2008 年的利润推迟变量 t 检验结果。

表 4 按产权性质分组 t 检验结果

利润推迟变量 (v_t)	非国有控股公司			国有控股公司		
	均值	T 值	P 值	均值	T 值	P 值
V07	-0.1923	-1.864	0.065*	-0.0638	-0.866	0.388
V08	0.1269	1.230	0.222	0.1105	1.499	0.136
V07- V08	-0.3192	-1.984	0.050**	-0.1743	-1.634	0.104
非国有与国有控股公司 V_{t07} 差异对比	T 值			P 值		
	-1.777			0.078*		

(注: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

从表 4 的非国有控股公司的 2007 和 2008 年利润推迟变量 t 检验结果来看,非国有控股公司 2007 年存在利润推迟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且 2007、2008 年样本组间的利润推迟变量存在显著差异,说明非国有控股公司 2007 年存在显著的推迟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从国有控股公司的利润推迟变量 t 检验结果来看,2007 年的 v_t 均值为-0.866,但不显著,且 2007、2008 年的 v_t 样本组间的差异也不显著,说明国有控股公司 2007 年不存在明显的利润推迟的盈余管理行为。同时,本文还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利润推迟变量做了样本组间的 t 检验,结果表明非国有控股公司的利润推迟明显要高于国有控股公司的利润推迟,并且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初步证实了本文的假设,即相对于国有控股公司,非国有控股公司更可能进行

推迟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

(三) 多元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按照全样本、国有控股公司样本、非国有控股公司样本分别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5。

表 5 分样本多元回归结果

	模型 1 (全样本)	模型 2 (全样本)	模型 3 (非国有控股公司)	模型 4 (国有控股公司)
截距项 (α)	-1.942** (-2.11)	-1.631* (-1.73)	-6.646*** (-4.05)	1.236 (1.01)
Property	-	-0.200* (-1.72)	-	-
First	0.642 (1.61)	0.610 (1.53)	0.806 (1.16)	0.652 (1.48)
Director	2.028* (1.84)	2.174* (1.97)	5.310*** (2.86)	0.861 (0.68)
Manshare	2.911 (0.89)	3.413 (1.04)	2.517 (0.77)	-7.792 (-0.02)
$\Delta Eps_t / P_{t-1}$	-1.267* (-1.96)	-1.296** (-2.01)	-0.504 (-1.36)	-0.985* (-1.68)
Size	0.042 (1.00)	0.018 (0.40)	0.219*** (2.73)	-0.100 (-1.65)
Debt	-0.534*** (-4.85)	-0.535*** (-4.87)	-0.363*** (-3.15)	0.861 (0.68)
行业控制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88	288	98	190
Adj R^2	13.35%	13.77%	43.96%	6.46%
F 值 (p 值)	2.80 (<.0001)	2.78 (<.0001)	3.99 (<.0001)	1.55 (0.065)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双尾检验的 t 值)

表 5 中，从包含全样本公司的模型 1 和模型 2 的多元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对利润推迟变量的影响后，截距项 (α) 值分别为-1.942、-1.631，并在 5%和 10%水平上显著，说明所得税改革实施后，公司存在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现象，与王跃堂 (2009) 研究结论一致。

在加入产权性质变量的模型 2 中，可以看出 Property 系数为负数，且在 10%水平上显著，说明相对于国有控股公司，非国有控股公司利润推迟的盈余管理程度更大。同时，从模型 3 的非国有控股公司的回归结果显示，回归的截距项 (α) 值为-4.568，比模型 1 和模型 2 的截距项 (α) 值都大，并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反映非国有公司存在强烈的避税动因盈余管理行为，这与表 4 的非国有控股公司的利润推迟变量的 t 检验结果一致。而且从模型 4 的国有控股公司的回归结果看，截距项系数变为正数，为 1.236，但统计上不显著，无法说明国有控股公司存在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行为，这些结果证明了本文假设。从模型的拟合程度看，模型 3 的非国有控股公司回归结果的 Adj R^2 高达 43.96%，而模型 4 的 Adj R^2 仅为 6.46%，

而且 F 值也仅为 1.55。如果进行全样本回归，模型的 $Adj R^2$ 分别为 13.35% 和 13.77%，说明本文根据前人研究和理论推导的模型，在解释公司利润推迟变量 V_t 时，非国有控股公司样本适用性最强，国有控股公司样本最差，其原因可能是国有控股公司也许根本没有进行利润推迟的盈余管理行为。

控制变量上，在全样本和非国有控股公司三个模型检验中，**Director**（独立董事比例）与 V_t （利润推迟变量）显著正相关，说明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的公司，董事会的监管越强，公司进行利润推迟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特别在非国有控股公司样本中，系数和显著性水平都有提高，但在国有控股公司中，**Director** 变量的系数变为正数，但不显著。这个结果说明独立董事的监督角色在非国有控股公司发挥得更好，因为民营企业独立董事承担的监管处罚风险比国有控股公司的独立董事大，出于自身风险考虑，民营企业独立董事会更有动力监督上市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潘克勤，2010）。在其他控制变量中，除了以国有控股公司样本外，**Debt** 变量与 V_t 负相关，在 1%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回归的结果与债务契约假设相反，但与李增福等（2010）的结果吻合，可能的解释是，公司在面临债务困境时，调减当期利润既可以为新的契约签订做好准备，又可以享受降低税负优惠，因此，在面临双重收益时，债务困境的公司更可能进行推迟利润。而 $\Delta Eps_t / P_{t-1}$ （利润平滑指标）与 V_t 在 4 个模型中均为负相关关系，说明公司利润越高，公司利用盈余管理进行避税的动机越小，从而证实管理层盈余管理的利润平滑动因的存在。**Size**（主营业外收入对数）与 V_t （利润推迟变量）的系数为正，但统计不显著。控股股东持股比例（**First**）与利润推迟变量（ V_t ）在 4 个模型中均为正相关，但统计上都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相对于公司外部的政府（税务机关），节税利益对所有股东的影响是一致的，重要的是大股东有没有动机去节税。

另外，在对全样本、国有控股公司样本和非国有控股公司样本的多重共线性验证结果显示各模型方差膨胀因子（**VIF**）在 1.3 左右，说明本文多元回归方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六、研究结论及研究意义

本文研究了 2008 年税制改革中，税率降低公司是否存在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以及影响公司盈余管理的其它因素。通过 t 检验及多元回归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所得税改革后，所得税率下降的公司，公司在考虑税率降低带来的税收优惠利益时，会选择进行利润推迟盈余管理行为，尽可能享受避税给公司带来的好处。（2）与国有控股公司相比，非国有控股公司推迟利润的盈余管理程度更大。通过分样本的多元回归分析，非国有控股公司存在显著的避税动因盈余管理行为，而国有控股公司基于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行为则在数据上得到证实；（3）独立董事对公司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效率更多地体现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程度间并不存在显著关系。

我国所得税制改革后的企业行为和经济后果的经验研究局限于所得税改革后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以及融资策略的改变（王跃堂等，2009、2010；李增福等，2010、2011）。本文研究对他们的研究结果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不同上市公司在进行避税动因盈余管理动机的差异，并从产权角度对研究结果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是现存文献的一个拓展和补充。同时，本文研究所得税制改革的企业行为，便于投资者看透公司行为的本质、政府监管部门获悉监管的重点领域和方法。

参考文献

- [1]白重恩, 路江涌, 陶志刚. 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06 (8): 4-13.
- [2]戴德明, 姚淑瑜. 会计——税收差异及其制度因素分析[J]. 财经研究, 2006 (5): 48-59.
- [3]戴德明, 音亮. 取消所得税“先征后返”优惠政策后上市公司的行为选择[J]. 当代财经, 2005 (2): 114-118.
- [4]李增福, 董志强, 连玉君. 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还是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基于我国 2007 年所得税改革研究[J]. 管理世界, 2011 (1): 121-134.
- [5]李增福, 李娟. 税率变动与资本结构调整——基于 2007 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的研究[J]. 经济科学, 2011 (5): 57-69.
- [6]李增福, 郑友环. 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方式比较——基于应计项目操控和真实活动操控的研究[J]. 财经研究, 2010 (6): 80-89.
- [7]刘芍佳, 孙霏和刘乃全. 终极产权论、股权结构及公司绩效[J]. 经济研究, 2003 (4): 51—62.
- [8]刘行. 税率的粘性——基于所得税法改革的经验证据[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2 (5): 1-8
- [9]吕伟. 分析师跟踪、产权安排与公司避税行为——来自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的经验证据[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0 (11): 60-66.
- [10]潘克勤. 独立董事比例、产权性质与长期债务融资契约[J]. 经济经纬, 2010 (1): 68-71.
- [11]平新乔, 范瑛, 郝朝艳. 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 2003 (11): 42-53.
- [12]王跃堂, 王亮亮, 贡彩萍. 所得税改革、盈余管理及其经济后果[J]. 经济研究, 2009 (3): 86-98.
- [13]王跃堂, 王亮亮, 彭洋. 产权性质、债务税盾与资本结构[J]. 经济研究, 2010 (9): 122-136.
- [14]吴联生, 李辰. 先征后返、公司税负与税收政策的有效性[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 (4): 61-73.
- [15]吴联生. 国有股权、税收优惠与公司税负[J]. 经济研究, 2009 (10): 109-120.
- [16]叶康涛. 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支付: 基于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的差异的研究[J]. 中国会计评论, 2006 (2): 205-224.
- [17]朱凯, 俞伟峰. 控股股权性质、债务税盾与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J]. 财经研究, 2010 (12): 116-127.
- [18]CAI H B, LIU Q and XIAO G. Does Competition Encourage Unethical Behavior? The Case of Corporate Profit Hiding in China [J]. Economic Journal, 2009,119:764-795.
- [19]BARTOV E, Gul F A, and TSUI S L., Discretionary Accruals Models and Audit Qualification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1,30(3): 421-452.
- [20]DESAI, DHARMAPALA. Taxes,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Diversification Opportunitie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9, 93: 703-714
- [21]DHALLJWAL D, FRANKEL M, TREZEVAND R. The taxable and book income motivations for a LIFO layer liquid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4,32(2): 278-289.
- [22]DOUPUCH N, PINCUS M. Evidence on the choice of inventory accounting methods: LIFO versus FIFO[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88,26(1):28-59.
- [23]ERIEKSON M, HANLON M and MAYDEW E. How much will firms pay for earnings that do not exist? Evidence of taxes Paid on allegedly fraudulent earning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4, 79(2):387-408.
- [24]GRAHAM J R. Debt and the marginal tax rat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6(41): 41-74.
- [25]GROSSMAN S J, OLIVER D and HART. Takeover Bids, the Free-Rider Problem, and the Theory of the Corporation[J].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0,11 (1): 42-64
- [26]GUENTHER 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response to corporate tax rate changes: evidence from the 1986 Tax Reform Act[J]. Accounting Review, 1994,69(1): 230-243.
- [27]JONES J. Earnings Management During Import Relief Investigation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1 (29): 193 – 281.
- [28]SCHOLEM M, Wolfson M. Taxes and Business Strategy: A Planning Approach.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2.

[29]SHLEIFER A, VISHNY R W. 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1997. 52(2):737-83.

[30]THOMAS J, LOPEZ P R, REGIER and LEE T Y. Identifying tax induced earnings management around TRA 86 as a function of prior tax aggressive behavior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axation Association, 1998, 20(2): 37- 56.

Tax Regime Reform, Property Rights Arrangement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of Tax Avoidance

Xie Xiangbing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As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corporate income tax reform in 2008, the paper observes the listed companies' tax avoidance motive of earnings management behavior. The research samples include the companies which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 will decline after the reform.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rofit reduction in companies which tax rate declines before the reform year. The further results indicate the profit change behavior exists only in the non- state-owned holding companies. The study provide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property rights arrangements can affect corporate behaviors significantly.

Key Words: Tax Regime Reform; Property Rights Arrangements; Tax Avoidance Motivation; Earnings Management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24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0BJY020)

作者简介: 谢香兵(1979—)，男，安徽安庆人，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公司财务与税务研究。

¹王跃堂(2009)用了上市公司2000到2007年的相关数据，李增福等2010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分别使用上市公司2001到2008和2002到2008年的相关数据。

²是本文承袭刘芍佳、孙霏和刘乃全(2003)的研究，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终极控制人数据，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其中：国有控股包括国有独资、国资部门以及国有企业；非国有控股包括自然人、职工持股会、民营企业、村办(街道)集体企业、乡镇一级的政府部门、乡镇集体企业或外资企业。